



薪传丛编

主编 陈思和

分册主编 张业松

待读惊天动地诗

——复旦师生论七月派作家



我为什么写作 胡风

我为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而写

我为表现中国人民久别的生活斗争

希望和平而写

我为反映现实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1945年12月

我为什么写作 胡风

我为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而写

我为表现中国人民久别的生活斗争

希望和平而写

我为反映现实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我为追求进步而写

——1945年12月



薪传丛编

主编 陈思和

分册主编 张业松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B104

Supported by Shanghai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Project Number: B104

待读惊天动地诗

——复旦师生论七月派作家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待读惊天动地诗: 复旦师生论七月派作家 / 张业松分册主编.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6

(薪传丛编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7-5336-5014-8

I. 待… II. 张…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7343 号

责任编辑: 王竞芬

装帧设计: 吴亢宗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 编: 230601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义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50 0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定 价: 39.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3683078

总序

◎ 陈思和

安徽教育出版社约我主编一套能够体现复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特色的丛书，我欣然答应，并将丛书取名薪传丛编。薪传者，不是强调个人的学术成就，而是体现复旦大学几代学人孜孜于某些领域言传身教，薪火传递的学术轨迹。丛编者，所体现的并非是一两种领域，而是多种领域，将分门别类，汇编成集。第一套是以人物研究为主题，编成四集：鲁迅研究论丛、巴金研究论丛、胡风研究论丛以及沈从文研究论丛。以后还将进一步总结前辈的研究成果，鼓励后来者的研究方向，一套一套编下去，弘扬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实绩。

复旦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建立于 19 世纪 50 年代初，经几代学人努力，形成深厚的学术积累。著名学者贾植芳先生为本学科开创者，担任现代文学教研室第一任主任。当时共同组建学科的教授还有：文学史家唐弢、戏剧家余上沅、著名作家方令孺、近代文学专家鲍正鹄等，这些前辈们分别对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及当下文学创作、戏剧五个方向都有精深研究和重要贡献，在当时名列前茅，在以后影响深远。此外，当时在中文系任教的著名教授中有陈望道、

郭绍虞、刘大杰、赵景深、陈子展、吴文祺等前辈学者，他们或为 20 年代文学研究会成员，或为 30 年代左翼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或为最早的新文学史编撰者之一，他们的名字与学术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密不可分，他们的著述泽被后代。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80 年代，第二代学术带头人整体崛起，潘旭澜教授研究当代文学，吴中杰、陈鸣树教授研究鲁迅，王永生教授研究现代文学批评史，王继权教授等研究和整理近代文学史料，皆有重大建树。他们承上启下，教书育人，为学科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尤其在学科资料的整理方面，贾植芳教授参与领导、主编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和《中国当代作家资料丛书》，都是穷当时全国学界之力集体攻关的大项目，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是全体教研室同仁努力合作的成果，至今仍然是本学科最严谨的工具书之一。潘旭澜教授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章培恒、王继权等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90 种）都是 20 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替代的基础文献。

19 世纪 80 年代起，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巨变迭起。一是学科范围拓展，原来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相互隔离的状态被打破，自 20 世纪初贯穿到当下文学，形成了宏观的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格局；二是吸收了来自西方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形成更加开放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在这种学术风气中，复旦大学该学科点始终居于潮流之先。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构成、重写文学史的提倡与论争、人文精神的追寻与讨论、文学史空间的开拓与发现、世界华语文学地图的拓展、文学与语言的综合研究与深入，等等，复旦大学学者的声音始终参与了本学科最前沿的理论创新与探索。这些成果对全国范围内的学科建设、理论创新都有直接的推动意义，也引起了港台和海外学术界的关注。

新世纪以来,本学科点的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阶段。2004年教育部批准陈思和教授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6年教育部又批准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为复旦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为搭建“复旦—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及世界华语语际文学研究国际学术平台”奠定了基础。在国内的人才引进方面,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正式加盟复旦中文系,领导了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中心,2005年获得了教育部审批的全国第一个文学写作硕士点,将学院式研究与推动文学创作实践完美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当下文学创作尤其是海派文学创作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袁进教授、通俗文学研究学者栾梅健教授先后加盟复旦,恢复近代文学研究室,结合本系教师的原有实力,完成了近代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学科整合。由此,本学科形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下文学研究的三个学术制高点。学术力量分布平均,学术梯队结构整齐。近年来,一批年轻的博士学有所成,先后通过留校、引进或回国,本学科点目前已有博士16名,其中博士后3名。从根本上完善本学科点的梯队建设,大幅度年轻化和高学历化,在通俗文学与主流文学、文学史整体和作家个案、传统学科与新兴学科、学院研究与创作实践、中国文学与世界华语文学等方面的综合研究,显示了毋庸置疑的学术优势。

除了宏观的理论研究以外,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始终没有放弃过对于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研究和文本细读。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大多数都能兼通现代文学经典和当下文学创作的双重研究,在现代文学经典方面,他们集中在鲁迅研究领域,形成了全国有影响的专家群体,同时,他们又对当下文学创作有广泛的兴趣和追踪的批评,如潘旭澜对杜鹏程的研究,吴中杰对柳青的研究,吴欢章对闻捷、郭小川等诗人的研究,在当时都是有影响的文

学批评实践。这些良好的学术风气,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被后辈学人所继承。我们从本丛编的内容中可以看到,贾植芳先生关于巴金研究的观点、胡风路翎研究的观点,传到了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再传到学生的学生的学生,至少形成了四代同堂的研究梯队。鲁迅研究从吴中杰、陈鸣树等前辈到青年学者郜元宝教授的学术历程中,取得了开拓性的发展,关于沈从文研究,吴立昌教授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现在又传到了张新颖、刘志荣等青年学者那里,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尤其关心,从王蒙、宗璞到张炜、王安忆、余华、严歌苓、贾平凹等小说家,从绿原、牛汉、彭燕郊等老一辈诗人到第三代诗歌群体,将近四十多位作家的创作在复旦的本学科点都有专门的跟踪式的研究。这些自发形成的研究规模和持续不断的研究热情,形成了本学科点的一个鲜明特色。

我常常说,传统就是一道水流,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水底的石头,传统的水流浸漫我们,滋润我们,又带走了我们生命的信息,一代代地传下去。我以为这套丛编的出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光大传统,继往开来,是我们的责任。希望丛编能够长期地出版下去,保存我们这个学科在每个阶段的学术研究特点和标志性的学术成果。

2007 年 7 月 29 日于黑水斋

目录

总序(陈思和)	1
第一编 胡风理论	
贾植芳: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	3
陈思和:胡风对现实主义理论建设的贡献	12
张国安:论胡风文艺思想和外国文学的关系	40
鲁贞银:鲁迅与胡风	60
鲁贞银:论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	96
刘宏伟:胡风文艺理论的黑格尔因素	109
袁凌:胡风“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和受难性质	126
文贵良:胡风的话语方式	140
郜元宝:“给他们许多话”:胡风、路翎与鲁迅传统	154
第二编 路翎创作	
李辉:灵魂在飞翔	
——《路翎晚年作品集》序	169

张业松：“一生两世”与强制遗忘	
——关于“路翎叙述”的叙述	177
张新颖：没有凭借的现代搏斗经验	
——与胡风理论紧密关联的路翎创作	194
潘嘉：“恶”、“疯”以及精神旷野的流浪	
——论“原始强力”在《财主底儿女们》中的展现	214
刘云：从“思想式写作”到“马克思主义式写作”	
——路翎从《财主底儿女们》到《战争，为了和平》所展现的美学面貌差异分析	251

第三编 “七月”群像

孙乃修：贾植芳小说杂文散论	271
李振声：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	285
刘志荣：地火在运行	
——张中晓与《无梦楼随笔》	294
何言宏：严酷年代的精神证词	
——“文革”时期牛汉的诗歌写作	313
张业松：关于舒芜先生的是非	330
段怀清：诗与一代之事	
——关于诗人冀汭、《诗垦地社丛刊》及其他	375
周燕芬：《希望》终刊后胡风同人的社团活动	390
附录：	

1.《思想的尊严——胡风诞辰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目录	414
2. 本书作者简介	417
编后记(张业松)	422



待读惊天动地诗

复旦师生论七月派作家

○ 第一编 胡风理论

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

◎贾植芳

胡风是个文艺理论家，他因为他的文艺思想而受难，也因为他的文艺思想而永生。在中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受难者有许许多多，现在大多数人都已获得平反昭雪，但对胡风来说，他的冤案的平反不仅仅意味着他个人在政治上、品性上的清白得以证明，也不仅仅意味着因他的关系而受株连的上千个善良无辜者的灵魂得以安息，还有，胡风的平反意味着胡风的文艺思想将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在1949年以前写的9本著作重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在20世纪50年代向中央最高领导人提交的“三十万言书”，于1988年也由《新文学史料》重新刊发，胡风的文艺思想30年以来第一次不带一点“罪孽”色彩地袒露在当代年轻人的面前，使人们终于发现，文艺史上许多因为后来的历史大劫难和血的教训迫使当代人认真反思的尖锐问题，譬如如何区分现实主义与政治工具，如何在创作中体现大写的人的力量，如何借鉴与引进外来进步文艺的营养和批判传统文化的封建糟粕，如何反对庸俗社会学对文艺创作的腐蚀，如何冲破“重大题材”的理论束缚而深入日常生活，如何从生活中去把握活生生的、有血有肉

的人物真实性而反对去写神化的英雄人物,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文坛上的理论工作者迫切、严肃地思考的问题。但是,早在这位蒙冤含辱的老人 30 年以前的文艺思想里,这些问题就已经引起了足够的深思,并在理论范围内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探讨。从某种意义上看,胡风文艺思想给当代文坛带来的震动,比胡风本人以及胡风冤案的传奇性与动人性更要壮观得多,也正是这个原因,胡风文艺思想比胡风本人更不容易获得某些人的宽容,以致使胡风文艺思想的平反比他在政治上的平反要整整迟到 8 年之久。

1988 年 6 月 18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1988〕6 号文件,在 1980 年对胡风集团作政治平反的基础上,又对他的文艺思想、宗派诸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澄清和新的说明。文件宣布撤销原来文件上对胡风关于“五把刀子”的说的指责,并明确指出,胡风文艺思想问题完全可以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双百方针,让人们通过文艺批评进行正常的讨论。这就意味着胡风文艺思想又可以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国内的理论界展开平等的自由的讨论了。但是我们,特别是作为胡风的朋友,又同是受难者的我们,又不能不由衷感到这个文件来得太迟一些了,因为作为当事人的胡风在这个文件下达时已经去世 3 个年头了。如果他能够活着知道他的文艺思想已经取得了他一贯视为精神支柱的党的理解与谅解,他该会有多么高兴。

不过,广大的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因这个文件的迟到而停止他们在学术上的探索和思考。自 1981 年起,陆陆续续的,国内学术界就开始发表重新评价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最早是在江苏的《雨花》杂志上,发表了吴调公的《关于胡风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介绍了胡风的现实主义理论;第二年,北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陆续发表了关于胡风“民族形式”理论的争鸣,到第三年(1983 年),《苏州大学学

报》发表胡铸的《论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总算正面接触到胡风文艺思想的核心。当然，这些文章基本上还是属于“拨乱反正”，为胡风洗冤性质的。以后又出了许多研究、阐释胡风文艺思想，并且通过对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来总结中国新文学史的经验教训，深入揭露理论上的教条主义给文学创作带来的严重危害。有些文章谈得很深入。譬如《文学评论》1988年第5期上发表的支克坚的《胡风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钱理群的《胡风与五四文学关系》、艾晓明的《胡风与卢卡契》以及一个关于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上的一些与会者的发言。《上海文论》1988年第6期上发表的陈思和的《胡风文艺理论的遗产》，以及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梁振儒、顾荣佳编的《披荆治林者的足迹》，收入了从1985年到1988年间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理论文章；此外，湖北出版的《湖北作家论集》，三辑里，每辑都收入了一些关于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文章；这一些文章，都可以看做是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对胡风文艺思想研究的初步成果。

对于胡风文艺思想的面面观，这些论文已经有了很好的阐释，我在此不必重复。我就以个人感受简单地谈一些对胡风文艺理论的解释。胡风的文艺思想比较复杂，又多是针对了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文坛上的实际斗争而发的，所以非局内人或者非专门搞理论研究的人，一般不一定弄得清楚。特别是因为胡风不是个纯粹的理论家，他是一个诗人气质很重的人，在他的理论表述中，夹杂着许多他自己创造的，没有经过严格的科学界定，却带有很浓重的主观愿望色彩的词汇，像“自我扩张”、“自我斗争”、“主观战斗精神”、“精神奴役创伤”、“血肉的现实的人生搏斗”，等等。本来一个理论家创造出特殊意义的词汇来丰富自己的理论体系，使自己的理论表达得更准确，并没有什么坏处。可是胡风所处的年代，正是文化水准普遍低下，教条主义盛

行的年代，一般人，甚至是文化工作者，面对着从抗战到建立新的政权这一时代的大变动，根本无法从直感上把握住时代，他们只能紧紧依靠一些流行的理论术语和理论的“本本”，按图索骥地去摸索时代到了怎样的一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理论的术语都被注入了固定的政治含义，像“无产阶级”就代表好的，“资产阶级”就代表坏的，“唯物主义”就代表正确，“唯心主义”就代表错误，这样就很容易记住，按照这些含义简单的名词来思考问题，一方面使人人都变得懂政治，懂哲学，懂文艺；另一方面，政治、哲学、文艺的复杂内涵都被简单化、庸俗化了。而胡风所创造的一系列含义特殊的新名词、新概念，完全不属于当时所流行的这套理论术语系统，所以它们无法被一般的人，甚至是担任各种领导工作的人所理解和认同。于是，人们就把这套新名词新概念以及它们所表达的文艺思想，都视之为异己。就好像古代有一个寓言，一个地方的猪都是白颜色的，于是当地人人都认为猪只能是白色的。后来有客人从别的地方带来一头黑猪，尽管它确实是猪，却谁也不承认它是猪，反把它视作妖孽。胡风的文艺思想当时就有这种被人们认为黑猪不是猪的处境。尽管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胡风都是一个努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始终努力地要把自己的文艺思想与当时时代以及共产党对文艺的要求融合起来。

譬如说，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是什么呢？通俗些讲，就是作家的一种战斗的人生观、一种战士的“人格力量”；从创作实践来说，就是作家在认识和表现现实生活时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它包含着作家对人生的强烈的爱憎态度。胡风所指的“战斗精神”也是有特定含义的，是指“从无产阶级先锋队所发动所领导的历史大斗争爆发出来的产

物”^①。也就是指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现实环境下的伟大实践精神。如果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一般人都会认同,但胡风偏偏用只属于他个人的语言来说出这个意思,就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因为胡风提倡文学创作要高扬“主观战斗精神”,这里面有“主观”两个字,人们就认为你提倡“主观”,就必然反对文学反映客观现实生活,你既然提倡“主观”,那就是提倡“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就是错误的,那么所谓“主观战斗精神”就是错误的,这种荒诞的解释和荒诞的引申,在当时却顺理成章。

还有,胡风曾提出文学要写出人的“精神奴役创伤”,什么是“精神奴役创伤”呢?其实就是“缺点错误”,文学要写出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当然要写人的缺点。广大生活在底层的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受着上千年封建主义的物质压迫和精神压迫,受着小生产私有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精神上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被奴役的痕迹,像阿Q,当他被人出卖,将送上法场时,他还在努力地画一个签押的圆圈,还为画得不圆而伤心,这种麻木、愚昧、自卑,集中地表达出封建意识形态对一个落后农民的毒害,把这个细节写出来,产生了震撼人生的艺术效果。鲁迅把这种缺点概括成“国民性”,胡风进一步具体化,称之为“精神奴役创伤”。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胡风自己有个解释,他说:“在科学分析上用‘缺点’去指明,但在创作上一定要用‘创伤’去感受。”^②胡风用的是形象思维,他的概括集中表达了鲁迅在著名杂文《春末闲谈》里描绘的一种现象,鲁迅说,有一种细腰蜂,它用毒针刺在小青虫身上,让小青虫处于不死不活的麻木状态,然后就在小青虫身上产卵,等卵变

① 《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收入《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4期。

② 《论现实主义的路》,收入《胡风评论集》(下),35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成幼虫时,就靠食小青虫为生。鲁迅认为数千年来统治者就是这样用封建意识毒化了人民,使人民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为统治者所奴役。胡风正是从这一形象延伸出“精神奴役创伤”,认为在劳动人民身上,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精神奴役”所造成的“创伤”,进步文艺就应该像鲁迅那样,挖掘出这种创伤,使人惊醒,克服这种“创伤”而走向新的人。这本来是一个常识,就连毛泽东也说过:“对人民群众的缺点错误不是不能表现”,当时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正受到成千成万的研究者颂扬,但是胡风这个提法却受到了许多人无情的攻击,他们认为,胡风既然提出要写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那么就是反对写劳动人民的英雄形象,就是丑化人民。

这样一些例子还有很多,胡风的每一个观点当时几乎都受到了严厉的批判,现在仔细看起来,胡风的理论和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体系,20世纪50年代的一些批判胡风的文章,大多数都是在概念术语上望文生义的错误解释,任意地夸大本来就是由批判者自己造成的理解上的错误,并把这种错误强加到胡风身上。这看上去很荒诞,但在当时,这场荒诞剧是用很严肃的态度去演出的。其实,胡风在理论表述上运用大量新的名词概念并不是胡风的错,正相反,这表现了一个理论工作者的特点,胡风自觉地在实践中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努力去把握时代的本质,但他从没有把这些新获得的理论感受立刻照搬到他的理论中去,按一般的本本主义者那样,照抄一些教条了事,当胡风亲身感受了时代的进步与理论的进步以后,他就努力从自己活生生的感受出发,创造出活生生的理论语言,让他尽了力而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化到个性化的文学语言中表述出来。因此,胡风的理论,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基本原理又融合了他自己独特的理解与体会。他将一个时代的统一的政